

政治义务的立与破:基于自愿主义的一种审视逻辑

王彩波 徐百军*

〔摘要〕 许多政治义务理论致力于证成公民个体具有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而自愿主义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的核心主旨在于: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政治义务必须是经过其本人同意的一种自愿承担。具体来说,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的这一理论内核贯穿于它的三个常规版本和两个修正版本之中,常规版本包括明示同意、假然同意与历史性同意,而多数同意与隐然同意则为其修正版本。与此同时,作为修正版本的隐然同意还涉及两个“应用特例”:一个是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另一个是居住地默许行为。

〔关键词〕 自愿主义;政治义务;多数同意;隐然同意

一、引言

自从人类开始政治共同体生活以来,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的关系问题就一直伴随其中,而且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常识性的认识: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是相互的,没有无政治权利的政治义务,也没有无政治义务的政治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化约论式的逻辑归纳只是从理论面向上展现了两种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而在实践面向上的博弈状态则是它们之间更为常态的关系。可以说,在争夺政治话语市场控制权的过程中政治义务遭到了政治权利的强势排斥,日渐被边缘化,于是政治权利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政治话语,罗纳德·德沃金甚至称政治权利为人们手中的“政治王牌”^①。实际上,德沃金的比附并不是十分的贴切,正如威廉·A·盖尔斯顿所说:“权利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但是,它们不可能像纸牌中的王牌那样起作用。也就是说,权利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但它们不是我们这个道德世界的唯一价值。”^②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政治义务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当然,经验性事实也印合了这种推断,其实一直以来政治义务都没有完全逃逸出政治哲学家的逻辑视

* 王彩波,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百军,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130012。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研究”(09YJA810008)的阶段成果之一。

① R. M.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xi.

② [美]威廉·A·盖尔斯顿:《自由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多元主义》,佟德志、庞金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域,它只不过是某种方式“隐匿”起来了而已。

事实上,公民个体是难以回避政治义务的,因为作为“被镶嵌于”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不可能成为纯粹的“无牵绊的自我”,于是摆在公民个体面前就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负有政治义务?第二,我们负有什么样的政治义务?相对来说,第一个问题要重要于第二个问题,因为它直接关涉政治义务的“存在性”,因而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政治义务的立与破。

实际上,围绕着政治义务问题的解决所形成的理论都是政治义务理论,即使是否定政治义务存在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也概莫能外,因为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否定政治义务的存在也不失为解决政治义务问题的一种方法。一般而言,对于政治义务概念的不同体认将会影响到对政治义务存在与否的价值取向,比如西蒙斯就用“特殊性要求”来限定政治义务,当然他也承认这样做存在一定的缺陷,那就是有可能实际上将“舍弃”许多解答政治义务问题的传统路数。^①与此同时,西蒙斯还表示他极为不满意对政治义务的下述两种限制:^②一是理据的单一性假设,即要求政治义务有且只有一个理由;^③二是理据的普适性假设,即将政治义务看做一种“总称的义务”,它要求所有的公民或者特定国家的所有公民对他们的政府负有义务,否则政治义务就是一种虚幻的存在。^④不过,在很少情况下学者会将这两种限制捆绑在一起,西蒙斯称一旦这样做就是给政治义务套上了一种“双重符咒”,并指出约翰·拉德就是典型的下咒之人,因为在拉德看来政治义务是一种对社

会中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唯一的且普遍的道德要求。^⑤

为此,西蒙斯强调指出衡量政治义务解释的“成功”标准有三条:(1)确切性,即要求这种解释在其应用的诸原则的适当范围内,对其所适用的人们形成政治上的束缚;(2)完整性,即要求这种解释对所有的且仅仅受这种束缚的那些人形成束缚(不管其确切性如何);(3)广泛性,即要求这种解释要确保在大部分(或许许多)国家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许多)公民在政治上受这种束缚。^⑥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条并不是要求同时必须满足的,因而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或标准组合来衡量时,就会得到相应的“成功的”政治义务理论。就西蒙斯个人而言,他认为确切且完整的政治义务理论就能满足他的要求。具体来说,西蒙斯的政治义务理论大体上可被划分为三种:交互性理论、团体性理论和自然责任理论,其中交互性理论又细分为同意理论、公平游戏理论和感激/感恩理论。^⑦

当然,有些学者并不一定完全同意西蒙斯的这种具体划分,比如莱斯利·雅各布就将政治义务区分为以公民中心的政治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论。^⑧在雅各布看来,“政治义务的公民中心理论试图参照每个个体公民的所作所为来解释民主国家的权威。”^⑨他将同意理论和公平游戏理论归为此类。与完全考虑公民的行为或意愿的公民中心理论正好相反,“政治义务的国家中心理论认为,民主国家的权威依赖于国家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个体公民的自愿行为。”^⑩这种政治义务理论也包括两种,分别是功利主义理论和以正义为基础的理论。而杰里

①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1.

②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35-37.

③J. Ladd, "Legal and Moral Obligation", in J. R. Pennock and J. W. Chapman (eds.), *Political and Legal Obligation*, New Brunswick, N. J.: Aldine Transaction, 2007, pp. 3-35.

④J. P. Plamenatz, *Consent, Freedom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

⑤J. Ladd, "Legal and Moral Obligation", p. 27.

⑥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55-56.

⑦A. J. Simmon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duty to obey the law", in R. G. Frey and C. H. Wellman (eds.), *A Companion to Applied Ethics*,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 50-61.

⑧[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的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吴增定、刘凤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⑨[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的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第71页。

⑩[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的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第80页。

米·沃尔德伦则仅仅将政治义务理论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获得性义务,它主要包括同意理论、公平游戏理论和感激理论;一类是自然责任理论。^①相对于沃尔德伦分类而言,约翰·霍顿的分类看上去稍显复杂,在霍顿那里,政治义务理论被划分为五种:(1)自愿主义理论,即同意理论;(2)目的论理论,主要指功利主义理论;(3)道义论理论,假然同意理论、公平游戏理论、自然责任理论以及感激理论即属于此;(4)哲学无政府主义理论;(5)团体性理论。^②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尽管在不同学者那里,政治义务理论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但是基本上可以说这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异”,因为它们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不同学者所认可的政治义务理论大同小异。第二,学者们并没有局限于严格的“义务”意义上的政治义务,他们基本上都将作为责任的政治义务纳入了考察视域。我们在这里着重分析自愿主义理论对政治义务的证成及其反驳情况。

二、自愿主义的三种常规版本: 明示同意、假然同意与历史性同意

从时间溯源上来看,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始于柏拉图,随后在社会契约论家那里得以系统成型,对此做出重要贡献的包括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等。比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曾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所有主权者的权力从根源上说都是经过被统治者每一个的同意而来的。不论选择者进行选择时是为了共御外侮(例如经过彼此同意选出一个人或一个议会来保卫自己时就是这样),还是为免死而服从一个征服他

的敌人都一样。”^③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洛克的《政府论》当中:“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④而卢梭甚至赋予“全体公民的同意”以“至高无上性”:“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任何根本法是不能予以废除的,即使是社会公约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破坏这个公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怀疑这个公约之被破坏乃是非常合法的。”^⑤应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建构成系统的同意理论并非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集体积淀”的结果,为他们做出过理论铺垫的就有下述几位主要的思想家:乔治·布坎南、理查德·胡克、阿尔色修斯、格劳修斯以及约翰·弥尔顿。^⑥

实际上,从自愿主义角度来证成政治义务的核心是利用了作为特殊权利典范性来源的承诺模式,^⑦但是这立即引来了一个问题:公民个人在什么时候做出过这种承诺或者同意与政府达成契约,从而自愿承担了服从的政治义务?应该说,从休谟开始人们便不再相信“原初契约”这一“高贵的谎言”了,也就是说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由于受限于“现实可检验性”这一瓶颈而遭受了第一次沉重的理论打击。^⑧与休谟等人对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的诘难稍有不同的是,雅各布仍然以社会契约理论无法满足他所谓的“个体性要求”而否定了自愿主义对政治义务的证成,在他看来社会契约理论“仅仅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政府有权利统治作为整体的人民或国家,却没有解释它为什么有权利对一些特定个人进行统治。”^⑨不过,社会契约理论通过在当代的“方法论转向”而出现了复兴,它开始用假

①J. Waldron, “Special Ties and Natural Duti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93, vol. 22, no. 1, p. 3.

②J. Horton, *Political Obligation* (Second Edition),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③[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4页。

④[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9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修订第3版),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9页。

⑥[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郭为桂、李艳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5页。

⑦[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的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第72页。

⑧[英]休谟:《论原始契约》, [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9-138页。

⑨[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的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第73页。

然同意理论来证成政治义务,^①然而对于假然同意理论究竟还是不是一种同意理论学者们是存在争议的,毕竟假然同意理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消解同意理论的潜在可能性。^②

退一步讲,假设我们承认“原初契约神话”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下述事实: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一代全体成员都同意遵守与政治共同体签订的原初契约,从而自愿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西蒙斯将这种同意称为“历史性同意”。他认为霍布斯和卢梭的著作中暗含着大量的这种同意^③。不过人们不禁要问:先辈的历史性同意能否对所有时代的所有后代公民都有约束效力呢?如果历史性同意真有这种约束力的话,那么一种不是我本人亲自自愿承担的政治义务就会落到我的头上,这是不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境况下,我的行为实际上受到了作为他者的“先辈”的决定,而我还能被视为完整意义的自主个人吗?针对这些疑问,西蒙斯就指出,“历史性同意”是在政治义务实际承担者的授权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同意,严格说来它“违背”了同意理论的“核心宗旨”。^④

此外,“历史性同意”还有一“变种”:一国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历史上签订的确认双方权利和义务边界的“政府契约”,所以后代承担的政治义务必须以原初契约为一个必要条件。^⑤对于这一“变种”,西蒙斯认为它只具有“勉强的说服力”:第一,原初契约能否达成是不确定的,这就可能将所有政府宣布为非法;第二,即使原初契约能达成,这也可能将所有政府置于一种“十分迂腐的境地”,因为政府的合法与否仅仅悬于一纸契约。^⑥“历史性同意”在证成政治义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

遭到这样的质疑:随着时空条件的变迁,作为签订“原初契约”一方的最初的政治共同体可能会发生改变,这样一来改变后的政治共同体是否还会遵守先前的政治共同体所签订的约定呢?换言之,人们对“原初契约”的持续性效力的怀疑削弱了历史性同意对政治义务的证成。

三、自愿主义的两种修正 版本:多数同意与隐然同意

人们除了对“历史性同意”产生质疑之外,萦绕在他们心头的还有其他一些疑虑:(1)按照同意理论,同意本质上只能是一种“个体同意”,也就是说,政治义务的产生必须得到受其约束的每个公民个体的同意,而全体一致的同意如何能够做到?(2)我对政治共同体的承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自愿承担政治义务的同意”呢?针对这两个问题,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又推出了两种修正版本的同意理论:一是多数同意;一是隐然同意。就多数同意而言,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著作种就已经有所体现,不过多数同意在某种程度上常常被看做是对同意理论的一种“退却”。^⑦或许说“退却”似乎只是一种轻描淡写,实际上多数同意具有一种“危险性倾向”:如果在多数同意下,所有的公民都负有服从的政治义务,那么那些表示不同意的少数也必须服从。显然,这些少数人对政治义务的服从是一种“被迫行为”,所以托克维尔将之斥之为“多数的暴政”。^⑧而严格按照同意理论来说,要么是全体一致的同意,要么是达不成任何同意,没有多数同意这种“中间态”,可

①H.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5, vol. 59, no. 4, pp. 990-999.

②毛兴贵(主编):《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导言第7页。

③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60.

④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60-61.

⑤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61.

⑥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61.

⑦A. Gewirth, "Political justice", in R. B. Brandt and K. E. Boulding (eds.), *Social Justic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2, p. 135.

⑧[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7-291页。

见为了现实的可操作性而扭曲了同意理论的“理论纯度”。有时候多数同意为了替自身的存在作辩护常常要借助于历史性同意,这样一来,“多数同意被认为仅仅对那些选择政府的最初契约论者有约束力;对于后代来说,它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样,原始订立契约全体一致同意创立政府,在原始契约之后,所有的人都有义务接受多数人选择的政府形式,而不论它是哪种特定类型的政府。”^①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它证成了政治义务,因为它并没有直面同意理论的“理论内核”。于是隐然同意便开始登场了。

应该说,隐然同意是为了解决“明示同意”无法满足达成全体一致的“个人同意”的“人数需求”的一种策略性应对,塔斯曼就表示如果只有“表示过同意”的人才被看做是国家的真正成员,那么国家就会面临严重的“萎缩”风险。^②于是作为“默许”的隐然同意取代明示同意成为同意理论的真正阵地。^③霍布斯虽然提到过“默许”的存在,确切地说他是用“推测的”^④来暗指这种存在,但是总起来说他的阐述并不是很清楚。而对于隐然同意,洛克的论述是最丰富的。^⑤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洛克的相关论说引述如下:“既然一切人自然都是自由的,除他自己同意以外,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料想,究竟什么才算是一个人同意受制于任何政府的法律的充分表示。通常有明白的同意和默认的同意的区别,这是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唯有明白同意加入任何社会才使任何人成为该社会的正式成员、该政府的臣民,这是不容怀疑的。困难的问题在于应该把什么举动看做是默认的同

意以及它的拘束力多大——即是说,当一个人根本并未作出任何表示时,究竟怎样才可以认为他已经同意,从而受制于任何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有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有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这不管他所占有的是属于他和他的子子孙孙的土地,或只是一星期的住处,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只要身在那个政府的领土范围以内,就构成某种程度的默认。”^⑥通过洛克的这段话,我们看到在他那里“默许”被当做一种“没有表达”的同意,然而在西蒙斯看来这种解读是对默许的一种曲解,因为就本质而言,默许仍然是一种姿态或者表达,而不是表达的缺席,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而已。^⑦塔斯曼也与西蒙斯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即便是默许也必须是“会意的”,也就是说“默许的实施者”知道他在做什么以及“默许”对他意味着什么。^⑧不过塔斯曼将默许所产生的政治义务等同于“儿童式义务”,他说:“实际上,未表示同意的成年公民就像儿童一样,他们受统治却未经他们本人的同意。监护和依赖期被过度延长了。”^⑨更有甚者,如汉娜·皮特金认为洛克的“默许”是对同意本身内涵的一种“扩大”,某种程度上他使同意变得面目全非了,而且他对政治义务的论证给人一种“欺骗感”,因为根本不存在隐然的不同意这种东西。^⑩不仅如此,在皮特金看来,洛克的本意就是将默许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同意,即将“共同体的创立者所订的原初契约的条款”作为同意的内容。^⑪之所以说在

①[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第67页。

②J. Tussman, *Obligation and the Body Polit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37.

③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79.

④[英]霍布斯:《利维坦》,第97-108页。

⑤P. Russell, “Locke on Express and Tacit Consent: Misinterpretations and Inconsistencies”, *Political Theory*, 1986, vol. 14, no. 2, pp. 291-306.

⑥[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第74-75页。

⑦[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第73-76页。

⑧J. Tussman, *Obligation and the Body Politic*, p. 36.

⑨J. Tussman, *Obligation and the Body Politic*, p. 37.

⑩H.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I”, p. 995.

⑪H.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I”, p. 995.

皮特金的解读中默许具有“特殊性”是基于下述两点来判定的:第一,皮特金指出默许的实现是公民个人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实际上洛克并没有真正重视个人同意,他更大程度上将政治义务的基础归源于“政府品质”,这样看来,皮特金对洛克的这一解读从根本上否定了洛克的经典同意理论家的地位;^①第二,皮特金认为对洛克而言原初契约的条款是“自明的”真理,于是这个契约存在与否的历史真确性就是“无关宏旨的”,它只是一种逻辑建构而已,而假然同意成为唯一相关的同意,它是由假设的、永恒的、抽象的、理性的人做出的。^②与此同时,皮特金也对塔斯曼的“儿童式义务”进行了同样论调的批判,她认为塔斯曼的症结就在于他的关注点不是政治义务问题而是国家中的成员身份问题。^③

西蒙斯并不认同皮特金对洛克的这一解读,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读”,理由是:其一,这种解读明显不符合整个洛克论说语境下的激进个人主义和自愿主义思维;其二,皮特金在得出她的上述推论时犯了一个简单错误,即她没有注意到同意可能只是产生政治义务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种可能性。^④于是,西蒙斯提出我们需要在“同意信号”的行为和“暗示同意”的行为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所谓“同意信号”实际上就是行动者同意意图的真实表达,这种表达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肢体行动等媒介。在西蒙斯看来,一般存在三种主要类型的同意:(1)承诺;(2)书面契约;(3)授权他者的一种行为。他说他个人倾向于将第三种同意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意行为,当然并不是完全绝对。与此同时,他还对作为同意的次要选项的承诺与真正意义上的同意进行了细致区别:第一,严格意义上的同意是涉他行为,而承诺一般是涉己行为,当然也存在特殊的例外情

形,对于这一点普拉门那兹也表示赞同;第二,虽然承诺和严格意义上的同意都能产生权利和义务,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就前者而言,义务是主要的,而权利是从属的;就后者而言,权利是主要的,而义务是从属的。同样的,这种区别也不是完全绝对的。进而西蒙斯提出了满足“同意信号”的两个一般性条件:一是同意必须具有“目的性”且是有意为之;二是同意必须具有“自愿性”。^⑤实际上,理查德·弗拉斯曼在西蒙斯之前就曾对他所谓的第一个一般性条件进行过论述,在弗拉斯曼那里他将其细化为三点:(1)行为者知道他对什么表示同意;(2)行为者有同意的意图;(3)行动者向同意的对象表达出了同意的意图。^⑥

就“同意信号”与“暗示同意”这两者而言,西蒙斯着重对后者做了分析。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默许”并不等于“暗示同意”。在西蒙斯看来,在政治领域中沉默要被视为有意义的“同意信号”必须满足下述五个条件:(1)潜在的同意者对当时的情形是知晓的;(2)潜在的同意者了解相应的表达程序;(3)潜在的同意者对于决定是否表示不同意的考虑时间的理解是无误的;(4)表示不同意的可接受的方式是合理的且易于实施;(5)表示不同意之后不能让潜在的同意者支付难以承受的高额成本。^⑦西蒙斯之所以要求只有在全部满足上述五个条件时默许才能被明确地视为“同意信号”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点:即使是默许,也需要目的性。正如他所说:“只有当默许被看做深思熟虑的主动承认时,才能保持同意理论的现实说服力。因为,同意理论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只有在同意仍然是毫不含糊的基础的情况下,也只有在同意的方法避免个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或者违背意志的情况下受到政治约束时,才是有吸引力的。很显

①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84.

②H.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I”, p. 997.

③H.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I”, p. 995.

④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86.

⑤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76 – 77.

⑥R. E. Flathman, *Political Obligation*, New York: Atheneum, 1972, p. 220.

⑦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80 – 81.

然,如果我们允许默许不是出于本意,那么同意理论的这些本质特征就荡然无存了。”^①至于“暗示同意”,西蒙斯认为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1)如果行为者心智、态度等各方面都正常,那么在导致同意的相应情形发生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行为认定为“暗示同意”; (2)“寓意”行为者同意的行为就是“暗示同意”; (3)如果行动者正在实施某一同明确同意行为相同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暗示同意”。^②而“暗示同意”与“同意信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通过审慎思虑后的担当,因为它无法证成政治义务,在西蒙斯看来洛克恰恰犯了这个错误。^③不仅如此,西蒙斯还认为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④、艾伦·格沃斯^⑤和普拉门那兹^⑥身上。对于他们的这一错误其他学者也给予了相应的批判,如史密斯就批判了格沃斯的同意理论。^⑦在此我们还需要补充这样一点:普拉门那兹将“同意”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同意,它既可以指明示同意,也可以指隐然同意;一种是间接同意,它主要指选举中投票所表达的对政府的同意与否的态度。西蒙斯并不认为普拉门那兹的这种区分对于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帮助。此外,循着普拉门那兹所区分的两种类型的同意,雅各布也给予了相应的分析,他指出“不投票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使间接同意证成政治义务的计划破产了。^⑧对于“不投票者问题”,格沃斯试图通过强调下述一点来给予解决:参与权而非实际的参与构成了同意。^⑨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格沃斯的解决方案实质上背离了同意理论的基本宗旨,滑向了皮特金那一边,即强调政府品质,在这里国家只要

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人们的同意,从而使人们背负起服从其统治的政治义务。其实即使是实际的参与选举也不能完全被看做是公民个人在表示同意:第一,实际参与选举投票并不能完全满足将沉默视为“同意信号”的五个条件;第二,实际参与投票选举的人可能基于竞选者的“当时承诺”而同意赋予其权威,但是这种承诺能否实现是未知的,而且获得权威的当选者日后所有行为并非都是有权威的。

此外,默许在证成政治义务的过程中面临着与明示同意一样的适用性困境,于是西蒙斯说:“在现代政治进程与惯例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同意理论的大炮被证明只是火力很小的口径步枪。”^⑩虽然西蒙斯否定了洛克的隐然同意对政治义务的证成,但是他也指出这种隐然同意从一定侧面告诉我们这样一点:政治义务的基础不是唯一的,对其合理的证成可能在别处^⑪。西蒙斯说隐然同意理论为我们指明了两条证成政治义务的“通道”:一条是公平游戏理论;一条感激理论。当然,西蒙斯依然否定了它们对政治义务的证成。

四、隐然同意的两个“应用特例”： 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与居住地默许行为

关于隐然同意还有两个“应用特例”:一个是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一个是居住地默许行为。就第一个特例而言,普拉门那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比如他说:“如果史密斯事实上当选了,那么说投票给他的人不同意他担任这一职位将是

①[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第76页。

②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89.

③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89 - 91.

④A. Meiklejohn, *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8, p. 11.

⑤A. Gewirth, “Political justice”, p. 138.

⑥J. P. Plamenatz, *Man and Society: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ies*, Vol. 1: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Locke*, London: Longman, 1963, pp. 239 - 241.

⑦M. B. E. Smith, “Is There a Prima Facie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The Yale Law Journal*, 1973, vol. 82, no. 5, pp. 960 - 964.

⑧[加]莱斯利·雅各布:《民主的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第73 - 76页。

⑨A. Gewirth, “Political justice”, p. 138.

⑩[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第86页。

⑪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94 - 95.

很奇怪的……只要一个职位有一套既定的选举程序,而且假定选举是自由的,那么参与选举过程的任何一个人都对当选该职位的人的权威表示同意,而无论谁当选。”^①不仅如此,普拉门那兹还进而认为只要选举公正,人们“参与选举过程”这一单纯举动就可以被认定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表示了同意:“即使你投票支持一个计划改变体制的人,你也对它表示了同意,直到它被改变为止……即使你不喜欢这个体制而希望改变它,你也通过投票使你自已负有一种服从这一体制下以合法方式获得权力的任何一个政府,这可以被恰当地看做是在表示同意。因为选举的目的就在于赋予那些赢得选举的人以权威,如果投票时你自己知道在做什么,同时又没有人强迫你,那么你就自愿地参与了赋予这些人以权威的过程。在这里你选举的动机以及你出于何种动机而做出一种承诺都不重要。”^②可以说,普拉门那兹的这一主张引来众多批判。^③西蒙斯认为普拉门那兹将同意的“象征”混同为同意的“表达”,而前者至多是一种隐喻而已。^④针对于这一点,西蒙斯又区分了“意向性”意义上的同意与“发生”意义上的同意,前者仅仅指存在同意或者奉献的意向,而后者指同意是一种能够产生义务的行为。通过这种区分,前者与政治义务的产生就彻底解纽了。^⑤

就第二个特例而言,洛克和卢梭都曾做出过相关的论述,而在当代罗斯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人们对居住地默许行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居住地能否成为默许的真正标志?如果严格按照同意理论来说,居住地要成为真正同意的标志,那么它必须经过每个居民个人的亲自同意,换句话说,必须努力建构一种“选择情形”以便让居民对“是否留在这一

居住地”上表示同意与否,但是这种“选择情形”是很少出现的。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只要进行适当的修正,这种“选择情形”是可以建构出来的,比如沃尔泽就从雅典关于公民和外邦人的区别实践中获得灵感,建议在现代可以建立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在本国居民达到一定年龄时也应该像侨民一样,对于他们“是否愿意成为公民”进行选择,一旦他们选择了不同意,那么他们就不再具有公民身份,而是以“国内定居的侨民”身份继续居住在出生国。^⑥这种机制的目的就是对于不同身份的人分配不同的政治义务:那些通过明确的同意选择了公民身份的居民,他们负有对政治团体或国家的政治义务,如服兵役的义务;那些通过明确的同意选择了“国内定居的侨民”身份的居民,由于他们继续居住在出生国,实际上是对国家的一种隐然同意,他们负有一种对社会的终极义务,即保卫社会免遭毁灭的义务,但不具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沃尔泽拒绝将隐然同意和明示同意产生的两种不同道德后果分别冠以“暂时性义务”和“永久性义务”,这种老式区别最早是由威廉·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律评论》一书中阐发的。沃尔泽强调指出两种不同的同意建立的政治义务的差异主要在持续时间内的义务特征上而不在义务的持续时间上。^⑦此外,沃尔泽还明确表示单居居住不可能产生公民所负有的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显然这种推论中暗含着这样一个预设:公民具有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而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这种预设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不过在西蒙斯看来,沃尔泽将“默示异议”融入他的理论当中,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皮特金看来对于短期移民而言,根本就不存在“默示异议”^⑧。

①J. P. Plamenatz, *Consent, Freedom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70.

②J. P. Plamenatz, *Man and Society: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ies*, Vol. 1: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Locke*, pp. 239-241.

③F. Siegler, "Plamenatz on Consent and Obligatio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68, vol. 18, no. 72, pp. 256-261.

④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92-93.

⑤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 93.

⑥M. Walzer, "Political Alienation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M. Walzer (ed.), *Obligations: Essays on Disobedience, War, and Citizenshi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12.

⑦M. Walzer, "Political Alienation and Military Service", p. 102.

⑧H.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I", p. 995.

当然,在给人们表达默许的选择余地时人们可以通过选择“移民”来表示自己不承担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但是“移民”是否是可行的呢?从现在的现实境况来说这种行为是存在困难的,因为现在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都不再是“无主物”,人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的迁入和迁出。不仅如此,“移民”可能对于某些表达不同意的行为者而言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结果,正如休谟所说:“对于一个贫困的、不懂外语或外国风俗、靠着微薄工资维持日食的农民或工匠,我们能否认真地说他对于是否离开自己的国家具有选择的自由吗?如果能够这样说的话,那么,对于一个睡梦中被人搬到船上、若要离船则只有跳海淹死的人,我们岂不可以同样宣称他留在船上就表示他已自由同意接受船主的统治。”^①尤文也持有与休谟相类似的主张^②。即使增加了分担移民成本的附设条件,移民仍然可能是难以承载的自由选项,因为原居住地对某些人来讲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载体”,这样一来,移民甚至变成了一种“灾难”。^③就此西蒙斯认为那些迫于移民压力而继续留在原居住地的人不能被认为他们的这一行为是对服从国家政治义务的默许,因为这显然难以满足默许得以成立的第五个条件。因而,通过居住地默许证成政治义务也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还要归因为这样一点:居住地默许难以满足政治义务的“特殊性要求”,也就说要是居住地默许能证成政治义务的话,那么我就必须对所有居住过的国家负有政治义务,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日常直觉意义上的政治义务。

与此同时,塔斯曼并不认同休谟和西蒙斯的这一主张,他认为他们实际上将“合宜性”和“必要性”混淆起来,也就是说,移民的不愉快并

不能成为阻碍其作为审慎选择的自愿特征的一个充足要件。^④在这一点上,哈瑞·贝朗有着与塔斯曼相似的看法,在贝朗看来一个人没有能力离开并不等于没有自由离开,只要一个人选择继续居住不是被迫的,那么他的选择仍然是一种自由选择,因而他就要负有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此外,他与沃尔泽一样也对居住地默许作了修正,那就是不再把居住地本身视为同意的表示,而是将对一个国家中的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的接受作为同意的内容。与沃尔泽不同的是,他提出了处理表示不同意者的三种激进途径:第一,脱离;第二,移民;第三,驱逐至无人区。如果表示不同意者任何一种条件都不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定他的行为是一种居住地默许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⑤

克洛斯科撰文对沃尔泽和贝朗的上述观点进行了专门的批判,在他看来,沃尔泽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语境是行不通的,因为很多人专注于“私人领域”并不在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权利,甚至将其看做是一种“负担”,这样一来他们大部分人会选择不同意成为公民以逃避政治义务,而这很可能会瓦解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至于贝朗,克洛斯科认为他实际上将人们置于一种“二难困境”之中,克洛斯科将之称为“同意或者离开机制”,这种困境是由国家造成的,无论选择哪一方实际上都是出于强迫,因而是无效的。^⑥同时,贝朗的观点中预设了这样一点:一个国家在得到其公民同意之前,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获得了对其领土的道德统治权。^⑦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的就是,还有一种反对居住地默许的观点,这种观点所依据的理由很特别,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使用一种“反例证伪”的方法,它认为一个国家中永远居

①[英]休谟:《论原始契约》,第127-128页。

②A. C. Ewing, *The Individual, the State, and World Government*, London: Macmillan, 1947, p. 217.

③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p. 99-100.

④J. Tussman, *Obligation and the Body Politic*, p. 38.

⑤H. Beran, *The Consent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⑥G. Klosko, "Reformist Consent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Political Studies*, 1991, vol. 39, no. 4, pp. 676-690.

⑦C. H. Wellman, "Toward a Lib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Ethics*, 2001, vol. 111, no. 4, p. 736.

住着自诩的革命者、间谍、无政府主义者、流氓团伙和逃犯,如果说对于这些人居住地默许也适用的话,那么这将是明显反事实的。这种观点最早由休谟提出,而现在经常被人引用,我们可以在普拉门那兹^①和高夫^②等人的文本中找到。不过,在西蒙斯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得要领的”,原因是它混淆了“意向性”意义上的同意与“发生”意义上的同意,他说:“理所当然地,就像我们可以做出承诺而无意信守承诺一样,我们也完全可以在表示同意时,无意让同意的对象行使权利。那么,不法行为的存在,看来不会影响人们想证明居住地可以构成同意的努力,只要政治惯例做出适当的修改。因为,我们务须谨记,在讨论同意与政治义务之关系时,我们只涉及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意。”^③

简要的阐述,而无论是它的三个常规性版本还是它的两个修正版本,当然也包括隐然同意的两个“应用特例”,实质上都始终贯彻着下述一种核心主张: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政治义务必须是经过其本人同意的一种自愿承担。概括起来讲,在自愿主义与政治义务的逻辑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体具有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因为自愿主义可以为此提供充足的“同意资源”;一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体不具有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因为自愿主义不能为此提供充足的“同意资源”。因而,对于自愿主义与政治义务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归结为这样一点:政治义务成也自愿主义,败也自愿主义。

(责任编辑:杨嵘均)

五、结语

综上,我们对于自愿主义政治理论进行了

Analyzing Political Obligation: An Review Based on Voluntarism

WANG Cai-bo, XU Bai-jun

Abstract: Many theori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try to prove that individuals have a political obligation to obey the will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voluntarism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core idea of the voluntarist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is that for each individual citizen, political obligation must be a voluntary commitment based on his consent. To be specific, this idea is the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three conventional versions and two revised versions of this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the conventional versions include express consent, hypothetical consent and historical consent; the revised ones include majority consent and tacit consent. At the same time, tacit consent as the core of the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theory also involves two “application examples”: one is the voting behavior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other is the tacit consent through residence.

Key words: voluntarism; political obligation; majority consent; tacit consent

^①J. P. Plamenatz, *Consent, Freedom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p. 7.

^②J. W. Gough, *John Locke's Political Philosophy: Eight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 70.

^③[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第89页。